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

李文海　康沛竹

Japan's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in China were pa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 policy in East Asia. Prior to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Japan stepped up its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gencies in China. Japanese spies who posed as diplomats, businessmen, and students, disguised themselves as native Chinese, or were in fact bought-off Chinese traitors, collected information in all parts of China in order to prepare for aggression against it.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broke out, Japanese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were even more widespread an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a series of military campaigns, such as the naval battle at Fengdao Island, the battle over the Liaodong Peninsula, and the battle of Weihaiwei. During the war, some vigilant Chinese officials became aware of the danger of Japanese spies and proposed counter-espionage measur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so succeeded in cracking several spying cases. Generally speaking, howe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not effective at uncovering spies or keeping its military secrets.

一个世纪以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 力量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这个角度而言,掌握和了解敌方的情况,对于战争的胜负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其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当时,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沉痛地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之者。"①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作家理查德·迪肯更明确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搜集了大量情报,"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94至189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②

那末,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间谍活动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呢?

一、甲午战争前在华主要间谍机关

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大陆政策"的产物。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还是一个封建领主割据、闭关自守的国家,与中国一样,深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逐步走上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明治天皇即位时宣称的"日本乃万国之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国威布于四方"的思想成为其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的理论基础,"大陆政策"的核心也就是用武

力向朝鲜和中国进行侵略和扩张。具体分五步：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中国东北及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南洋、亚洲以及全世界。在“大陆政策”的指导下，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增加军费。

为了配合军事行动，日本开始了对外尤其是对中国的谍报活动。1871 年，参议江藤新平提出应尽快派遣间谍，到中国搜集各种情报。他的建议被采纳并很快付诸行动。1872 年，日本第一次向中国派出间谍。这一次共派出 3 名间谍，他们是池上四郎、武市正干、彭城中平，都是外务省的官员。池上一行的任务是调查中国东北地区的地理、政治、兵备、财政、风俗等情况。他们三人伪装成商人，在 1872 年夏至 1873 年 4 月间，活动于营口、奉天一带。回到日本以后，他们向明治政府报告了了解到的中国各方面情况，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今日之状态，不数年中国将土崩瓦解。现今为我国解决朝鲜问题之最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③主张应利用清朝政府腐败，虚弱的时机，发动战争。此后，日本又陆续向中国台湾、华北及其他一些地区派遣了间谍。总的来说，派往中国的日本间谍，绝大多数都极力鼓吹尽快发动对华战争，他们的意见在日本高层决策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一时期，日本间谍在华活动基本上还是零星的，只是随着侵华战争准备活动的加紧，到甲午战争前夕，正式在华设立了间谍机关，才开始了大规模、有组织的谍报活动。

甲午战争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有汉口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尽管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一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汉口乐善堂成立于 1886 年，是甲午战争前日本在华最庞大的间谍机关。创办人荒尾精（1859－1896）是日本初期谍报活动的重要头目。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军衔为陆军中尉。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习中文，并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他撰写《兴亚政策》、《宇内统一论》等文，狂热地鼓吹侵略、扩张思想。他认为，日本如能统治中国，可以凭借从中国掠夺的物力、财力养 120 万以上的精兵，建一支庞大舰队，这样，就能使“东洋文明光辉宇内，亚洲威风扬于四海”。他还宣称，日本的皇国体系无比优越，因而，日本必须“统一六合四海”，使全世界奉仰日本天皇的“仁风”。荒尾精的这些理论很富有煽动性，在当时影响颇大，曾迷惑许多青年充当间谍，为日本政府卖命。荒尾精本人也因此很得上司赏识，1886 年春，他被参谋本部选中派往中国建立谍报机构。

荒尾精在中国得到了日本侨民的资助和支持。他在汉口建立了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作为掩护，然后逐步将触角伸向中国各地，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并以这些城市为基地，把触角伸展到乡镇农村四面八方。据记载，“倭夷无赖，每令亡命剃发改装，阴入内地”，“潜入直隶、山东、东三省、江浙、闽广等处侦察军情。”④根据侵略中国的总方针，荒尾精制订了一套严格的纪律和要求，详细规定了需要侦察的范围，主要包括：各类人物、地形地理、人口分布、风俗习惯、运输、服装、仓储、兵制、工厂、秘密结社等等。乐善堂的成员背负担挑，到处贩卖货物。货卖光了，就冒充医生、风水先生四处周游。遇到关卡盘查，汉语说不标准，就谎称福建人或广东人蒙骗过去。他们前后用了 4 年多时间，将搜集来的大量情报编成了《清国通商总览》一书。全书分二编三册，二千多页。这是日本根据调查材料综合整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最早大型文献，其中对清王朝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以及人民被奴役、被压榨等方面的情况描述尤为详尽、具体。此书的出版，对日本扩张主义分子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另外，汉口乐善堂还培养了一批

间谍，这批间谍成为甲午战争时期的骨干分子。汉口乐善堂的职员一般保持在十七、八人左右，先后有日谍30多人在这里工作过，主要包括日本浪人及国内间谍组织玄洋社等机构派来的所谓“志士”。甲午战争时期的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石川伍一、山崎羔三郎等人都是乐善堂出身的。

甲午战争前的另一个重要间谍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设在上海英租界内，成立于1890年，所长也是荒尾精，代理所长根津一，是以培养“中日贸易人才”为名的间谍训练机构。

日清贸易研究所表面上是日本民间开办的培养贸易人才的组织，但实际上，是经日本政府批准的、由陆军参谋本部出资开办的训练间谍的学校，这从研究所的课程设置、毕业生的去向就可看出。研究所学制三年，毕业后在中国实习一年，课程包括汉语、英语、中日问题等，研究所聘请了汉口乐善堂的一些职员为学生讲课。开办后共招收150名学生，分为3个班。1893年6月，这批学生毕业，当时，中日关系十分紧张，许多学生分赴中国各地搜集情报作为毕业实习。据清方记载，“倭人向在沪设有日清研究所，约七八十人，五月以前陆续散去，闻多改作华装及僧服者，分赴北京、津、烟、江、浙、蜀、鄂、闽、台各处。”⑤战争爆发后，有72名学生去广岛大本营报到，其中一些人成为著名间谍，向野坚一、福原林平、楠内友次郎等人都是研究所的毕业生。

其实，甲午战争时期在华的日本间谍并不很多，但影响颇大，比较著名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荒尾精外还有宗方小太郎、根津一、神尾光臣等。

宗方小太郎（1864－1923）是日本对华谍报活动的重要人物，前后在中国生活40多年。1884年来到中国后，结识了荒尾精，不久任乐善堂北京支部的支部长，负责调查河北、山东、山西、辽东等地情报。1887年，宗方小太郎只身一人周游东北、华北等地，他脚穿草鞋，带着一根手杖，徒步走了8个月，成为在中国内地徒步长途旅行的第一个日本人。战争爆发前夕，在日本大本营的命令下，他多次冒充中国人侦察威海卫北洋舰队的动向，获悉重要情报，因而受到上司嘉奖。

根津一（1866－1927）是继荒尾精之后来中国的重要日本间谍。他17岁考入横滨师范学校，不久因病退学，后考入日本陆军大学，与荒尾精等人交往密切，深受其影响，专搞侵华谍报工作。1890年被参谋本部派往汉口，后任日清贸易研究所代理所长。甲午战争前夕，他在上海从事秘密活动，指使手下间谍搜集情报。战时任日本第二军参谋，随军在金州登陆，提出进攻山东威海卫的具体作战方案。

另一个重要间谍神尾光臣（1854－1923），毕业于日本陆军教导团，1882年调入参谋本部搞谍报工作，被派到中国。1892年，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利用他的合法身份在中国从事间谍工作，专门搜集清政府的军事情报。甲午战争前，神尾在天津收买1名清政府军机处官员，通过他源源不断地获得军机处大量情报。他极力主张尽快与中国开战，在他送回本国的报告中，“往往过分夸大清国开战意图。”⑥以此敦促日本早下决心发动战争，他的报告对于日本发动战争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以上这些人，甲午战争时期，还有一批日本间谍活动于中国各地。这些日本间谍都精通汉语，一些人如宗方小太郎、根津一等都是从幼年时就学习汉文典籍，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一直被他们奉为座右铭，神尾光臣还是日本军界三大中国通之一。而且，由于日本与中国是同文同种的国家，“须发睛准与华民相类”，⑦稍作改装就不易辨认，这些对他们从事间谍活动都是极为有利的条件。此外，这些日本间谍都很能吃苦，

心甘情愿地为政府卖命，在他们看来，间谍活动是一项非常神圣的事业，是报效国家的“天职”。着重侵略思想和狭隘民族情绪的灌输，可以说是日本培养训练间谍不同于其它国家的一大特点。据一个英国人的评论，日本谍报机关选派、培养间谍“很少大手大脚地乱花钱，靠爱国主义”，“在对外国的实情一无所知的青年人心中，培养起一种强烈的民族感和尽忠报国的激情”，⑧作为鼓励他们从事间谍活动的精神动力。许多间谍得到升迁和重用，仅以神尾光臣为例，他后来历任辽东守备军参谋长、关东都督府参谋长、关东卫戍总督等要职，升到大将、赐男爵。一些日本间谍如根津一、宗方小太郎等还得到天皇接见。

二、日本间谍怎样为发动侵华战争作准备

80 年代以后，日本间谍在中国的活动进入有计划、有组织阶段，尤其是战争前夕的 1893 年，活动尤为猖獗。据各地奏报，“倭人在津日派奸细二三十人，或改装剃发，潜往各处窥探军情”，“京城之潜居者亦恐不少”。一些重要部门都有日谍在活动，比如，“上海机器局、天津军械所并获有奸细”。⑨有人说当时有日谍数百人，这个数字虽有些夸大，但日本间谍活跃于中国各地，无孔不入却是事实。他们或以外交官、商人、学生等合法身分作掩护，或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收买汉奸，四处搜集情报，为发动战争做准备。甲午战争前，比较重要的间谍活动有以下几起：

1. 侦察直隶海岸情况

1887 年，山本清坚（陆军中佐）、藤井茂太（陆军大尉）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之命前来中国搜集情报。山本等人的任务是在中国直隶海岸选择合适登陆点、运兵方法及上岸后的进攻目标。他们从山海关出发，沿洋河、滦河、北塘河、白河一直到大沽口，在长达 400 多华里的海岸线进行调查。根据山本等人提供的情报，日本陆军制订了直隶平原作战计划。当然，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由于日军占领了大连湾、旅顺口实施了威海卫作战计划，原先制订的直隶平原作战计划作了改变，未予实施。但这个计划的制订本身充分说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

2. 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

1888 年底，关文炳（海军大尉）奉命调查正在施工中的威海卫炮台以及威海卫通向荣成的道路、荣成湾形势，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关文炳早在三年前中日《天津条约》谈判时就随伊藤博文来华，后留在中国进行军事侦察。他化装成商人，在天津城外直隶总督衙门附近开办了一间书店，作为活动的据点。根据长期的侦察，他向日本海军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山东半岛的登陆地点。他认为，日本对中国开战时，对威海卫应采取背后进攻的战术，即从荣成湾登陆。他指出，荣成湾面阔水深，沙底适于受锚，无论遇到何等强烈的西北风天气，都可安全锚泊，而且这里位于直隶海峡外侧的偏僻海隅，离威海卫较远，正好拊威海之背。关文炳的建议经过反复核查，在战争中得到完全实施。

3. 川上操六中国之行

川上操六（1849－1899）是日本侵华谍报活动的奠基人，他少年入伍，1885 年 38 岁时升为少将，任参谋本部次长，负责向中国派遣间谍的工作。1893 年 4 月，身为陆军中将的川上操六亲自到朝鲜和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为发动战争做最后的准备。1893 年是日本对华谍报工作最关键的一年。当时，尽管日本政府的侵华方针早已确定，陆海军也为发动战争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但何时发动战争、能否取胜，还需要做出最后的判断，这就取决于谍报部门的情报。日本外

务大臣陆奥宗光直言不讳地说:"战之能成与否,悉听川上"。川上在考察了朝鲜的金山、仁川、汉城等地之后,乘船经烟台转赴天津。他们在天津停留了一个月。在此期,他参观了天津机器局,访问武备学堂,观看了炮兵操演炮术和步兵操练步伐,并亲自登上了北塘炮台观看山炮演习。在驻华使馆武官神尾光臣的陪同下,川上还对天津周围的地理形势偷偷地进行了考察。1893 年 5 月 14 日川上的视察日记是这样写的:"与神尾少佐视察天津城外围堤之南、西、北三面,周长四日里,高二间或二间半,厚二间或一间半。西南开阔,利于进攻,北面多水洼,不利于进攻。"⑩接着,川上操六又到了上海、南京等地,参观了上海的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等,并在荒尾精的陪同下,参观了日清贸易研究所。通过这次中国之行,川上"不仅看破了中国的极端腐败,而且对其陆军的强弱如何,甚至对地形、风俗人情之微,均得一一进行观察,确信中国不足畏,而增强了必胜信心。"⑪

4. **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

川上操六回到日本后,密令公使馆武官井上敏夫(海军少佐)、泷川具和(海军大尉)分头侦察渤海湾航道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天津、塘沽等地的设防情况。井上是 1892 年来中国的,他曾 3 次潜入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海防要塞,调查北洋海军的部署情况。这一次,他买了一艘小火轮,5 月份从烟台出发,用了 2 个月的时间,游历了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西海岸。每到一处,他都非常仔细地观察炮台驻防情况,"所走洋面均用千斤砣试水深浅,每处相距约一百多里不等"。⑫

与此同时,泷川具和也乘帆船从塘沽出发,沿渤海岸北行。在这之前,泷川潜伏在天津法租界内,化名堤虎吉,从事间谍活动已 1 年多。他有时装扮成商人,有时做苦力,在市井码头到处侦察,搜集了天津、塘沽一带的大量情报。接到川上操六的密令后,他沿海岸线游历,历时 1 月,对于沿岸各海口的水深、有无沙滩、海底是泥沙还是岩石、民船数目、运输情况等,都做了详细的侦察。他判定,北戴河以南的洋河口为大部队登陆的最适宜地点。此外,泷川还根据他了解的情况,随时向国内报告清廷的动向。7 月 9 号,他在报告中说:"内廷正在举办万寿庆典,原本不好动用干戈。北京政府中不仅有反对和非难李(鸿章)之行为者,而且愈近开战之际,堪为名将之声望者愈乏。当然,兵力方面未能稳操胜算,幸寄希望于俄国公使之调停,暗中依赖此种调停下之和平谈判。"他还指出,"华北一带大雨不断,由于涨水铁路被破坏,各地的电线也断了,道路泥泞,军队调动困难,人心动摇不定,军队中也往往听到有发泄不满情绪者"。他的结论是:"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⑬泷川的报告,反映了清廷回避战争及对日本有利的种种因素,他的报告,"对日本进行战争的决心起了很大影响作用"。⑭

5. **密切关注北洋舰队的动向**

北洋舰队成军于 1888 年,是当时中国也是东亚最大的一支舰队,拥有战舰 20 多艘,四万余吨,最大主力舰达七千三百吨,居亚洲第一,旅顺、威海要塞经营多年,有颇强的防卫能力。从当时双方实力来看,北洋舰队远远强于日本海军。但是,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膨胀,日本海军的军力不断加强,到战前已赶上并部分超过北洋海军。这时的日本也已拥有 20 多艘军舰,虽然最大战舰只有四千吨,但舰队总吨位超过中国。即便如此,日本对北洋舰队还是深具戒心,把它视之为发动侵华战争的巨大障碍。

1894 年 5 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之请,派兵助平。日本认为时机已到,立即成立了战时大本营,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朝鲜。在形势十分紧张、战争一触即发

的时候，日本间谍更加紧了活动，尤其关注北洋舰队的动向，大沽、牙山等地都有大量日谍在活动。7 月 21 日，北洋舰队的爱仁号、飞鲸号载增援士兵自大沽开出赴牙山，据当时随船的德国人满德报告，船只离港时，日本间谍密切关注，在码头梭巡侦察，手持铅笔，将所载物件逐一记数，并且，他发现，"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并随时用铅笔注载。…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⑮在这种情形之下，高升号开船日期被日方探知并被击沉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可见，为发动对华战争，日本进行了长期、周密的准备。由于日本间谍无孔不入的侦察，日军对于中国各地的地理形势、驻军情形、防御设施了如指掌，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⑯战争中，清军从俘获的日军身上搜出一份材料，其中对中国"驻兵多寡、有无、处所，分列甚悉"，⑰还有人亲眼见到日军进攻山东半岛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村、路、炮台、营房、山、河、井、树都画得十分清楚、详细，一目了然。不仅如此，经过长期的侦察，尤其是川上操六中国之行，日本人看到了清廷的政治腐败及消极避战的情绪，他们确信发动战争的时机已经到来而且日本有胜利的把握，宗方小太郎的看法在当时就很有代表性，他说："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判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是早已制其全胜矣。"⑱

三、甲午战争中的间谍与反间谍斗争

（一）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活动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频繁、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反多受其制。"⑲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

丰岛海战是中日海军的首次交锋，它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这次海战，是日本"不宣而战"下搞的一次突袭行动。许多中国近代史或甲午战争史著作，在谈到这次海战的爆发时，都提到日本间谍贿赂中国电报生、泄露高升号开船日期一事。这种说法的依据主要是 1896 年 10 月吏科给事中余联沅的一份奏折和姚锡光的《东方兵事记略》中的记载。余折是这样说的："天津电报局内倭寇买通 1 人，每月予以六百金。所以中国军情纤悉皆知，以致高升之覆及大东沟之战，倭人皆先得信。"⑳姚也认为："倭人间谍时在津，贿我电报学生某，得我师期，（高升号）适为所截。"㉑

其实，高升号开船日期并不是从天津电报局获得的，而是石川伍一从天津军械局得知的，这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最为成功的谍报活动之一。

石川伍一（1866－1894）是日本著名间谍，幼入私塾，后入兴亚学校专攻中文，19 岁时来华为日本海军搜集情报。在一本日本出版的《名人录》中，石川伍一名下这样写道："石川伍一，间谍。…受命赴中国活动，到过蒙古边境一带。中日战争中在华积极活动。"在石川伍一的间谍生涯中，侦察到高升号开船日期是他对日本海军的一个重大贡献。当时，他"冒广东人，剃发，穿中国衣服，"隐藏在天津军械局一个书吏家中。㉓丰岛海战后，日本组织撤退其在华桥民。石川伍一奉命随日本侨民乘船离开天津。但夜深船开之后，石川伍一决定继续潜伏下来。于是，他化装成中国人从船上跳下，又回到天津，"以一洋元酬剃工，为天津县李振鹏踪迹破案，"㉔在客栈

被捕。随后,在书吏家中搜出炸药及有关文件,据记载,“搜出私信一函,所有高升轮船兵若干,带兵官姓名并所带物件以及青莱若干斤,均详信内”。㉕被捕后,石川伍一对其间谍活动也供认不讳。他供认:自 1883 年以来,他一直在京、津等地往来,后住在军械所刘树芬家中。有一些中国人为他提供情报,刘树芬“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及军械局东局海光寺每天造子弹数量,照抄一份。”㉖他还“供出日本截我高升、操江二船,皆其先期电闻。”㉗可见,高升号开船日期确是石川伍一从天津军械局书吏处打听到并电告日军的。

石川伍一间谍案影响很大,牵涉到很多人以至清廷大吏。天津军械所书吏因“为窝主,传递消息”与石川伍一一同被斩首,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候补道张士珩因“于其所用书办家擒获日本奸细”也受到舆论指责。后来一些大臣纷纷上奏弹劾李鸿章,分析开战以来的种种失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调发军情又为奸细侦探,遂致高升船所载劲旅,悉为敌击沉。”㉘丰岛海战后,日本切断了中国至牙山的海路,控制了朝鲜海域。

10 月下旬,日军分两路向中国大举进攻,一路以山县有朋为司令官,由朝鲜义州附近渡过鸭绿江。另一路以大山岩为司令官,进攻辽东半岛。进攻辽东半岛的作战计划,是由藤崎秀、宗方小太郎等十几名间谍共同商议制订的。他们提出,“先取大连湾附近之大窑口,再进而攻略大和尚山、石门村,占领金州,以绝旅顺后路。”㉙10 月 24 日深夜,大山岩率军到达辽东半岛金州以东海面,“饵居民 4 人登船,购乡民衣服,”㉚然后派 6 名间谍秘密登陆以进一步确定进攻方针。这 6 人是:藤崎秀、大熊鹏、猪田正吉、向野坚一、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他们乘水雷艇登陆,分 3 组活动,后来仅向野坚一一人生还。向野坚一登陆后,混在民工中为清军修筑工事,在普兰店、复州、金州一带刺探军情,有一天被清军发现逮捕。为了消毁藏在鞋里的地图,他故意踩在泥水中,将鞋里的地图弄湿踏烂,然后用 2 个银元收买押解的士兵为他松了绑绳,深夜跳崖逃走。大山岩部队根据他提供的最新情报,一举攻占金州。

前面已经提到,选择荣成湾作为登陆点以及采取包抄后路的战术,也是由间谍提出的。1888 年以后,日本间谍多次到威海、荣成一带进行侦察,潜入威海驻军防区和炮台重地。进攻前夕,日军派 8 名间谍乘船到成山头右侧龙须岛侦察军情,他们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㉛1895 年 1 月 20 日,日本陆军在联合舰队的掩护下在荣成龙须岛成山头登陆时采取的就是“远势登陆,抄我炮台后路”㉜的战术。10 天后,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南、北两岸炮台,封锁了港口,轰击刘公岛及港内的北洋舰队。2 月 16 日,威海卫完全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着着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㉝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据载:“上海吴淞口五万斤之巨炮毁于药水矣,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药皆毁于火矣。”㉞抓获石川伍一的同时,还缴获炸药地雷 8 箱,石川伍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积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㉟此外,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外交人员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也致力于谍报活动,譬如,“驻津倭领事及武随员二人…日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察。”㊱丰岛海战后,德国人满德在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就提醒说:“中国之驻倭使臣未归,倭国之驻京使臣未归,倭国之驻京使臣未返,非计也。何以故?中使在倭未能探听倭国军情,而倭人在中竟能洞悉中国军事。”㊲

(二)有识之士的反间谍建议

甲午战争爆发不久,对于日本间谍的活动,很多人就有所察觉并十分忧虑。一些有识之士

纷纷上奏，指出："当此兵衅既开，(倭人)难免不勾结内地奸民为之侦察机密"。所以，"此时中国纵有智勇深沉之将，欲出奇计，…必无一倭兵中计者，何则？事未行而机早泄也。"㊳有人还"既虑侦探军情，尤虑煽惑土匪乘间生事以牵掣兵力"，担心"会匪"、游勇等与"倭人勾通，乘机煽惑。"㊴因此，他们认为，战争中反间谍工作当为最要紧之事。安徽一位叫朱照的廪生的看法很具代表性，他说："用兵之道，密其事，晦其迹。神出鬼没，变化不测，毋使敌人得知我之虚实强弱，而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可以制胜，故缉捕间谍，兵家所先，"㊵把反间谍作为军事行动的先导。这些人还就反间谍问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首先，反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护日本间谍。甲午战争爆发后，总理衙门发了一份咨文，内容是："日本商民之在中国者，概由美国按照公法代为保护。"㊶一些日本间谍因而往往躲在租界内得到各国尤其是美国的袒护。据报，"有日奸在汉口租界外行走，营勇向前盘诘，正欲查拿，该倭人即持刀抗拒，避入租界。英美领事不肯交出，谓系日本安分人，即时护送其登轮往沪。"㊷一些间谍被捕后，也有外国为其说情，比如，福原林平等二人被捕后，"上海各领事均为该倭奸存希冀"，清廷也有些担心"就地正法恐滋饶舌。"㊸石川伍一被处决后，据驻美公使杨儒报告，美国多有责怪之意。针对这些情况有人强调指出，"两国交战虽有互保人民之条，而稽察奸宄尤应严密"，"美领事不得袒庇"，"如有拿获日本细作，不必递交领事馆，由中国衙门密行监禁。㊹

其次，主张实行保甲，严惩汉奸。

日本间谍往往通过汉奸为其搜集情报，据一些人分析，"倭奸之得潜伺于中国者"，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托庇于华人"，也就是得到汉奸的掩护，因而"非整顿保甲，极力搜查不能断其根株而空其巢穴"，认为清除汉奸才是反间谍的根本所在。他们提出应重治汉奸，"得其窝主，治以重法"。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人"虽有贪利忘义者，欲潜匿倭奴以济奸利，而有所不敢。"㊺尤其是，"大军所驻各州县市镇"，更"应责成举行保甲严查汉奸。如此，则敌人无从知我举动，可无高升轮船之失足。"㊻与严查的同时，他们提出还必须实行安抚的办法。有人认为，很多地方由于年年发生饥荒，再加上战乱、民不聊生，百姓无以活命，在日本间谍粮、钱的诱惑下不得不当汉奸。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仅仅靠严惩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关心民间疾苦，"拔赈以重生灵，救民命以收民心。"㊼张之洞等人还提出，日谍一惯"厚饵穷渔，多方引诱"，因而必须推行奖赏揭发的办法，并在海防重地办理"渔团"，他说："遇有倭人雇募窥探沿海沿江军情，该渔团能将来雇之人捆送到官，讯明属实，赏银 500 两。"㊽

此外，为易于辨认，还有人提出禁止日本人剃发改华装。由于日本人与中国人眼睛、头发的颜色一样，相貌多有相似之处，只是发式、服装不同，日本间谍在中国往往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很难识别。为此，有识之士提出，日本人在中国一律禁止改华装，否则按间谍治罪。张之洞等人就反复强调："既系安分，何必改装？…如查有华服倭人，即照奸细查办。"㊾

(三)、清廷破获的间谍案

甲午战争中，清廷还破获了几起重大间谍案，除了上面提到的石川伍一，还有 9 名重要日本间谍被逮捕处死。

1894 年 9 月，据南洋大臣刘坤一奏报，逮捕了 2 名日本间谍：一名叫福原林平，26 岁，一名叫楢内友次郎，28 岁。这两人都是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8 月奉根津一的指示赴东北搜集情报。他们冒充湖北商人，准备搭乘法轮去营口，因轮船推迟起程住在法租界内一家旅馆，后被人识破，9 月被处决。

与福原林平等人被捕前后，藤岛武彦、高见武夫2人也暴露被捕。他们冒充和尚住在寺中，后被僧人发现送官，在浙江被斩首。

前面说过的被派往辽东半岛的6名间谍中，除1人生还，其余5人都被捕。其中的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最为出名，都是荒尾精的部下，在日本谍报界被并称"三崎"。

山崎羔三郎是日本国内秘密间谍组织玄洋社的骨干分子。1888年25岁时来上海，曾在汉口乐善堂活动数年，经常化装为卖药商人和算命先生四处活动，甲午战争前夕在汉口开照像馆。战争爆发后，偷上中国运兵船到朝鲜汉城，冒充神户华侨药材商，潜入中国军队牙山阵地侦察。因藏有指南针、地图而被中国军队发觉逮捕，在押解途中逃脱。1894年10月24日花园口秘密登陆后第三天被清军依克唐阿部下捕获，于金州城外斩首。同时被处死的钟崎三郎、藤崎秀都是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钟崎三郎曾扮成药材商侦察渤海湾的北洋舰队情况，后转到山海关侦察中国军队驻防和调动情报。藤崎秀曾任日军翻译官，10月24日登陆后，因所携证件不足被百姓捕获。日本谍报机关对三崎之死极为重视，占领金州后，找到了三人尸首厚葬在金州城外崔家屯山上，并命名为"三崎山"。

甲午战争中，尽管清廷破获了几起间谍案，处死了10名重要间谍，一些人还提出了各种防谍建议。但从最后结果来看，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日本的胜利，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日本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各种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㊿日本人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甲午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是决定近代中国与日本两国命运的一场战争。战后的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中国败了，则更加严重地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陆奥宗光在战后不久写的《蹇蹇录》一书中这样写道："战胜的结果，对内对外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地位，加强了我国的势力，使过去曾经讥嘲我国只会模仿文明皮毛的欧洲列强从这种错觉中清醒过来；承认日本已经不是远东的山青水秀的一个大公园，而是世界上的一大势力了。"陆奥宗光引用一位英国学者的评论说："远东大战的结果，使一个帝国的声誉日上，同时也使另一帝国的声名扫地。"51

这场战争取得如此的结局，自然取决于许多因素，而惊心动魄的间谍战，这条与公开战线相辅进行的隐蔽战线，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事实上，甲午战争时期，日本谍报工作之所以如此成功，与清廷不能严守军事机密，不重视防范间谍有很大关系。一些间谍甚至受到清政府的保护，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宗方小太郎，他1877年周游北方战略要地，就是以"学生"合法身份、持有总署发放的通行证，受到清廷保护的。在两国关系已十分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清廷还为川上操六提供大量方便，予以"殷勤接待"，李鸿章甚至视他为上宾，请他参观了军工厂、军事设施、军队操练。一些人还为日本间谍提供情报，更为严重的是，为谋求个人私利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两国交战之时，仍给日本提供帮助的也大有人在。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居然"盗卖子药济倭，得银40万两。"52据记载，"我国奸商代渠办伙食等物者亦不少"，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侯补道张鸿禄"以米三千石售与倭人。"53不仅如此，李鸿章等人在对日本间谍的处理上，明显表现出袒护之意。比如石川伍一一案，先是"匿地雷事不奏"，54继而由于"供词牵涉李经方及军械所局员，"授意盛宣怀"勒天津县李振鹏改供，为李振鹏所驳斥。"后来，李鸿章又"立意不杀此人。云：'若杀之，殊有碍于和局'。"55此后，清廷

又抓获几名间谍，据给事中洪良品揭发，李鸿章“不独未杀，并每人送路费一百元，闻该督以‘杀了要赔钱’为辞。”㊻当然，石川伍一后来终于被处决，但此前种种内幕充分暴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另外，由于技术落后，甲午战争时期，清廷的密电码被日军破译。当时，中国的密码编制非常原始，规律十分简单、交换很少，容易被破译。破译时间是 1894 年 6 月 22 日，日本由此掌握了 6 月 6 日至 8 月 4 日驻日公使汪凤藻全部往返密电，计 54 件。由于清廷毫无觉察，整个战争中一直未改密码，以至在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 22 件也被全部破译，这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我们回顾一百年以前的这样一段往事，不仅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的判断，也是为了提醒今天的善良的人们，当我们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行进的时候，不要在这方面放松了必要的警惕。

---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以下简称续编)：《中日战争》(一)第 318 页。
②(英)理查德·迪肯：《日本情报机构密史》，也译为《日谍密史》，第 32 页。
③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日文版，上册，第 41 页。
④续编：《中日战争》(一)第 178、318 页。
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中日战争》(五)第 7 页。
⑥(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1981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第 64 页。
⑦续编：《中日战争》(一)第 188 页。
⑧《日谍密史》1984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38 页。
⑨续编：《中日战争》(一)第 88、51、184 页。
⑩德富猪一郎：《陆军大将川上操六》第 117 页。
⑪同上书第 124 页。
⑫《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 7，“高顺供词”。
⑬⑭《日清战争》第 72—73 页。
⑮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下册第 102 页。
⑯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1978 年第 1 卷，第 331 页。
⑰丛刊：《中日战争》(一)第 59 页。
⑱《宗方小太郎报告》第 11 号。
⑲续编：《中日战争》(二)第 350 页。
⑳同上书(一)第 329 页。
㉑丛刊《中日战争》(一)第 17 页。
㉒㉕同上书(三)第 108 页。
㉓关于这个书吏的名字，或刘桂甫，或刘五，或刘树芬，说法不一，实为同一人。
㉔丛刊：《中日战争》(一)第 154 页。
㉖续编：《中日战争》(一)第 235 页。
㉗丛刊：《中日战争》(三)第 39 页。
㉘续编：《中日战争》(一)第 250 页。
㉙《宗方小太郎日记》(手稿)。
㉚㉛丛刊：《中日战争》(一)第 37、55 页。
㉜㉝㉟㊱丛刊：《中日战争》(一)第 55 页，(五)第 467 页，(三)第 39 页，(三)第 11 页。
㉞续编：《中日战争》(一)第 184 页。
㊲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 102 页。

㊳续编:《中日战争》(一)第 51 页,丛刊《中日战争》(五)第 480 页。
㊴续编:《中日战争》(一)第 88 页,第 178 页。
㊵丛刊:《中日战争》(五)第 480 页。
㊶续编:《中日战争》(一)第 205 页。
㊷丛刊:《中日战争》(五)第 5 页。
㊸㊹续编:《中日战争》(一)第 205 页。
㊺㊼㊾丛刊:《中日战争》(五)第 480 页,449 页,6 页。
㊻㊽㊿续编:《中日战争》(三)第 205,363 页,(一)第 302 页。
51(日)陆奥宗光:《蹇蹇录》,1963 年,商务印书馆,第 91 页。
52丛刊:《中日战争》(一)第 154 页。
53 54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 178 页。
55续编:《中日战争》(一)第 302 页,233 页。
56丛刊:《中日战争》(三)第 109 页。

(上接 128 页)

三、学术气氛浓厚,畅所欲言交流。

讨论会除开幕式、闭幕式外,共安排了两场八人专题报告会,十八场九十人分组讨论会。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宗旨,学者们就许多新发现、新问题及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各抒己见,争发宏论,相互切磋交流,相互交换资料,气氛热烈融洽,心情欢快舒畅,从而增进了了解与友谊,加强了合作与研究。

四、组织有序,张弛有度。

会程安排紧凑合理,学术讨论与参观考察穿插进行。九日,学者们乘坐人民海军舰艇,参观考察了甲午威海之战古战场及设在刘公岛上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原北洋海军提督衙门。该馆是以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为主题的纪念遗址性博物馆,负责甲午战争纪念地所属二十六处遗址的管理保护。学者们对该馆在文物保护、古建筑修复、陈列展览、社会教育、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该馆的题词,令学者们大饱眼福,著名学者欣然挥毫,签名纪念。会后,学者们对威海市政府的精心安排深表感谢,对舒适的学术、生活环境,热情周到的服务交口称赞。

甲午战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且在很在程度上影响了远东乃至世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它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百年后的今天,在这个硝烟散尽的美丽城市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必将树起一座甲午战争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也必将推动甲午战争史研究迈向更为宽广的天地。